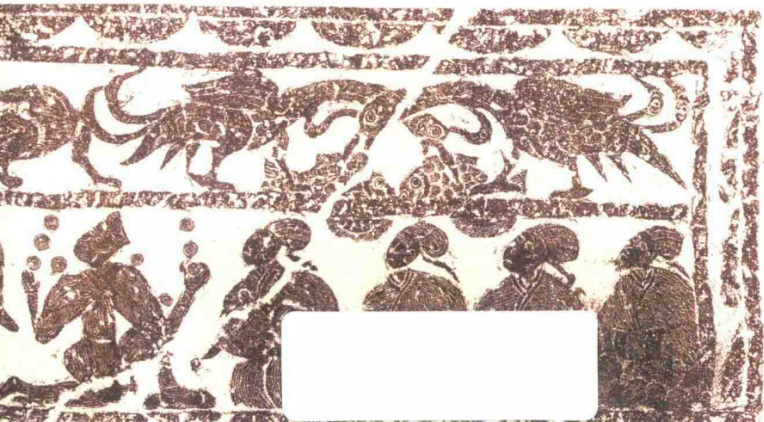


元读
典懂

左 与中国文化

春秋弦歌

龚留柱 著



传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传》与中国文化 / 龚留柱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2.10

(读懂元典)

ISBN 978-7-5222-0257-0

I. ①左… II. ①龚… III. ①《左传》—研究②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25.04 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11649 号

《左传》与中国文化

著 者 龚留柱
责任编辑 杜晓宇
封面设计 殷丽云
责任印制 周 然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2年10月北京第1版
202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265千字
定 价 62.00元

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弘扬元典 走向未来

——序《读懂元典》丛书

华夏出版社的《读懂元典》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很高兴有机会和读者朋友就这个选题说几句话，聊聊对元典文化的一些想法。

20世纪90年代，我曾主编过一套《元典文化丛书》，当时“元典”这个概念还不十分流行，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用“元典”，而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经典”。我当时是想写一篇小文来谈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就放下了。现在就借机来谈一点简单的想法。

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产生了一批影响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格的基础性文化典籍，如《周易》《诗经》《尚书》《春秋》《老子》《论语》等等。由于从汉代起儒家研习的先秦《五经》被国家确立为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循的思想法则，《五经》获得了在社

会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质疑的神圣性，一直延续至宋《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就形成了一批只能被尊奉而不能怀疑和批判的文献典籍。汉以后研习《五经》《十三经》的学问，被称为“经学”；经学典籍《十三经》，即被称为经书、经典。“经典”二字，代表着典籍的神圣和尊严。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教会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改变了我们对经典只能遵循而不能分析和质疑的思想态度，传统《十三经》成为我们研读、分析和思考的对象，而失去了不可分析的思想权威属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普及的今天，把传统文化典籍当作“经典”而盲从的传统积习，应该改变。虽然我们已习惯了“经典”二字，但在科学而理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播活动中，尽可能地避开不科学的做法，是文化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于是，我们选择以“元典”来指称《周易》《诗经》等等这批古老的文化典籍，并一般性地称之为“中华元典”。“元典”是什么意思呢？

元者，始也，首也，意谓“第一”和“初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化典籍，对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初始意义。

元者，大也，意谓宏大而辽阔。这批文化典籍提供的思想场域，涵盖了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诸多问题意识，具有全

覆盖的特点。

元者，善也，吉也，有美好、宝贵和嘉言之意。这批文化典籍提供了后世中国最宝贵、善良和美好的思想修养资源。

元者，基也，根也，具有基础、根本、本源之意。这批文化典籍是后世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一切思想元素都来源于此，一切思想的发展都以此为根基。

元者，要也，有主要、重要之意。这批文化典籍不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全部，但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总之，“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意蕴，“元典”称谓，既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传统的圣典、经典之义，又避开了对传统典籍非理性尊崇的嫌疑。这是我们对“元典”称谓的简要说明。

先秦和秦汉之际产生的“中华元典”包含了后世中国思想文化的各种因子，历史地决定了后世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方向、性质和特征。中国所以是中国，所以是今天这样的文化面貌，所以在文化精神、民族性格的方方面面都迥异于西方，即是由它们所奠基的。读懂元典，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自身的文化面貌，了解文化国情，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华元典诞生在春秋战国和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是对社会转型、社会变革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基础性问题

的回答。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前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对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意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唯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唯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这就是在两千年后我们还要重温元典的历史根据。历史昭明，再读元典并读懂元典，对当今社会的历史进步，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欣赏华夏出版社的这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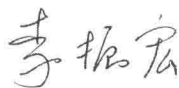
我了解丛书的部分书稿，知道它可以实现丛书组织者的初衷。

读懂元典，首先是要了解元典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意义。丛书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解读。

但读懂元典的真正含义，还不止于此。元典所以是元典，是被历史所证明的，是被历史选择出来的，它真正对后世历史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和奠基作用。所以，读懂元典，还需要了解这些元典典籍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对

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进而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作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反思。弄清这些问题，是读懂元典的深层次要求。所以，丛书作者也都着力于此，尽可能去梳理中华元典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历史影响。丛书的最大篇幅，都用在了读懂元典的这个方面。

这套丛书是有特色的，相信它可以受到读者的欢迎。希望丛书发挥出它强大的指引与激励作用，最终可以帮助当代青年认识我们的文化国情，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和文化特色，进而以清醒的头脑面对传统、走向未来。



2021.9.27

目 录

始晦终显:《左传》的来历与流传	1
书名和性质	3
作者和著成年代	15
《左传》的研究史	29
经史兼综:《左传》的基本内容及思想倾向	69
一代治乱史	70
社会全景图	78
解经书例与天道人道	101
重礼与重民	109
简册典范:《左传》与中国史学	123
编年之祖	124
直书和曲笔	138
经史和王朝正闰	156

文章正宗:《左传》与中国文学	173
《左传》的文学成就	175
《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	196
《左传》与中国古典散文	213
宽猛相济:《左传》与中国政治文化	239
天道远 人道迩	241
民为邦本 民利君与	263
礼法并存 宽猛相济	289
武略辉光:《左传》与中国兵学	317
止戈为武 居安思危	319
一鼓作气 无民孰战	336
见可而进 知难而退	357
主要参考书目	371

始晦终显：《左传》的来历与流传

《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在中国文化人眼中，这是一本赫赫有名的著作。它首先是历史名著。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历史，由此书得以保存，而且又写得特别好，唐人刘知幾评价它是“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其次它又是儒家经典。隋唐科举取士，其中有“明经”科，所规定的“九经”即含有《左传》。以后儒家的经典渐次增为“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左传》也都在其中，被刻石立于国学，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再次它还是一部优秀的散文杰作。清人刘熙载《艺概·六》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左传》作

为文章典范，影响了历代文人墨客。最后《左传》还可作为兵法来读。它多写战争，善写战争，清代李元春著《左传兵法·序》说：“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汉代以后儒将如关羽、吕蒙、杜预、岳飞等都好《左传》，或“讽诵略皆上口”，或自称“有《左传》癖”。

《左传》内容宏富，影响深远。两千多年来，无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整理、发掘、注释、研究，围绕着这座中华文化的“富矿宝藏”，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春秋左传学”，人们至今对之热情不减。一般来说，要成为文化上的一种专门学问或研究学科，如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红学”等，都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被研究者的出现具有学术上划时代的意义，它能反映广阔深邃的社会内容，人们能随着时日的推进和角度的变换，不断从中发现和推衍出新的价值。二是由于记载的缺失和年代的尘积，被研究者的成书和流传被蒙罩了层层迷雾，人们由于不同的认识而引发激烈的争论，形成一系列“热点问题”，一时又难以完全解决。

《左传》正是如此。它就像一位文化上的骄子宠儿，人人喜爱，却又来历不明，屡遭诟病。两千多年来，关于它的书名、性质、作者、著成年代等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涂抹者有之，洗刷者有之，一直到今天，《左传》仍是一部争议

较多的古典文献。

书名和性质

从《左氏春秋》到《春秋左氏传》

中国人历来重视冠名。从一个人的姓名上，可以看出他的世系所出、排行次第，也可以看出其志意所在。一旦关涉社会典制，更是要“名正言顺”，不容马虎。《左传》一名，并非原来就有，最初应为《左氏春秋》。有关史书对此书最早的正式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另外，河间献王刘德立《左氏春秋》博士，刘歆《让太常博士书》称《春秋左氏》，皆证明西汉及以前无《左传》之名。后来刘歆要为它争立学官，博士们反讥“《左氏》不传《春秋》”。为此到了东汉班固所作《汉书》，就开始用《春秋

左氏传》一名，简称《左传》而相沿至后世。

一名之变，关系到《左传》一书本来的性质是经学还是史学，也关系到《左传》与《春秋经》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儒学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和正统，受到官方的尊崇和保护。于是，凡被认为是孔子撰写或整理过的书，皆被称为“经”，意谓“天地古今之常道”。《诗》《书》《礼》《乐》《易》和《春秋》据说皆为圣人之作，于是号称“六经”。但经文简略又深奥，圣人在传授弟子时，以口头方式对其中包含的“微言大义”作了发挥补充。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把这些传授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称为“传”，即阐释注解经义的文字，如《易大传》《诗经毛传》等皆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首先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这是“经书”；接着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后三者就是我们习惯所称“《春秋》三传”。时间一长，“传”也有了某种权威性，也成了“大经学”的一部分，都被包容在儒家“十三经”之中。

班固改《左氏春秋》为《左传》，目的当然是使其依附儒经而纳入官学轨道，但却引来后世的聚讼纷纭而至今公案难断。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只能不避枝蔓再从“春秋”二字谈起。

孔子与《春秋》

作为单音词，“春”“秋”分别指两个季节，古今同之。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春种秋收自然重要，于是“春秋”二字连用以代表“年”，以表时间。《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里，把时间加上人的活动，“春秋”作为普通名词，等于编年的历史记录，在先秦时期广泛存在。刘知幾《史通·六家》论“春秋家”，提到有《夏殷春秋》，记商代太丁时事；《晋春秋》，记晋献公十七年事，并说：“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刘知幾还提到《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此语不见于今本，但《墨子·明鬼下》记载过四个鬼故事，分别“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此外，《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出使鲁国，观书于太史，见有《鲁春秋》。其时孔子方十二三岁，此“鲁春秋”当然指孔子之前早已存在的鲁国的编年史。

我国很早就有以文字记载的历史著作，殷商卜辞中常见“史”字，就是以手执简册之形。而且古代确有严格的史官制度，以确保文字记载历史的连续性。其实这种纪年史可以总类为“春秋”，具体到各诸侯国，还可以有不同的名称。如

《孟子·离娄》所说：“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把“春秋”由普通名词变为专有名词，也许正始自孟子。孟子认为圣人孔子为使后代的乱臣贼子恐惧而不敢为非作歹，特意作《春秋》。再加上此时儒家已成“显学”，对孔作《春秋》大力宣扬，而岁月久远之后，其他国家《春秋》大都亡佚不存，于是“春秋”这一概念聚缩为我们今天所见的这本万六千余字的《春秋经》。

《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是一个久争不息的课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孔子作《春秋》，即此书的著作权归孔子拥有。首倡此说为孟子，他两次提及孔子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在汉初已被视为经书，儒生自然认为它应出于圣人之手，从司马迁到董仲舒都以权威的声音力倡此说，后人靡然风从，遂成定论。此派的理由主要是：《鲁春秋》只是孔子创作的史料，经书体例规模乃孔子所制定。特别是经书中包含的“微言大义”，是原史书所没有的，“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王充：《论衡·艺增》）。对《鲁春秋》，孟子也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也就是说，孔子利用鲁国旧史，而完成了一部新的经学著作。这部书记事范围不仅限于鲁国，而是孔子周游列国并到周王室观书之后，把眼光和笔触放在了一代天下大势的演变上，

加以全面把握。这种观点为历代经学家承袭，一直到近代康有为，仍维护“《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孔子修《春秋》，即此书只是孔子对鲁国史书加以修订补充，不能算是创作。汉代的古文学家认为《春秋》源于鲁史，鲁史的发凡起例源于周公，所以孔子对《春秋》只是根据周公的鲁史凡例加以修订补充，不能算作近代意义上具有知识产权的著作。这种观点集中体现于晋人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序》中：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

杜预之说多为后世经古文学家宗奉之，如唐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专太牢之祭”（皮锡瑞：《经学历史》），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此说立足点是把《春秋》看做史书，孔子及其弟子对《鲁春秋》不

是直抄而是作了一定的删改、修正、提炼和加工，“笔则笔，削则削”，最终使它成为一部典范的编年史著作。人们把《鲁春秋》看做原始的未经孔子修订的历史著作，其作者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以别于后人所见而经孔子手订的《春秋经》。这种观点也为封建时代的经今文学家所诟病，晚清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一书中大加驳斥，这是经学内部今古两派之争的主要问题之一。

第三种观点主要为近代学者提出，认为《春秋》作者不是孔子，孔子不曾制作或删述《春秋》。从唐代以后，有些经学家日趋疑古。刘知幾在《史通·惑经》中对孔子和《春秋》的关系提出疑问，宋代王安石直讥《春秋》为“断烂朝报”，即认为其乃是鲁国的政府公报，又简文脱落错乱，不可卒读，与圣人无关。其后明朝人徐学谟又提出《春秋》即据旧史，其中本来就有缺文，并非孔子所笔削。不过囿于经学传统，古代的大多数学者对《春秋经》都持谨慎态度，不敢否定其出自圣人之手。民国初年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首开“孔子不作《春秋》”之说，认为《论语》中没有关于孔丘作《春秋》的记载；战国诸子中除《孟子》外，也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书提到《春秋》为孔丘所作；《春秋》无所谓微言大义。因此，他认为“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孟轲因为要借重孔丘，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